

# 晚清湘系势力的崛起与社会结构变动说略

董丛林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 湘系势力是晚清时期的一派重要军政力量。从其基本构成要素和特征上看, 政缘性与地缘性的结合、军与政的结合、内层与外层的结合以及一般兵员与上层的特殊关系等几个方面, 尤其值得注意。该派军政势力的崛起, 对晚清的军制、统治集团内部结构以及民间秘密会社的演变, 产生了醒目而重要的影响。此外, 也关联到社会经济、文化领域。而从湘、淮到袁世凯北洋势力递进嬗变的历程看, 湘系势力的崛起则显然有着奠基和肇端的作用。

**关键词:** 晚清 湘系势力 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湘系势力的崛起, 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事情。它对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明显影响, 从促使社会结构发生相应变动的角度看, 也比较醒目。

“湘系势力”, 这里是指晚清时期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开始, 以湘军为支柱崛起的一派军政力量。湘军显然属军事组织, 但发展起来的湘军并不是只有以曾国藩为统帅的一支, 而是多支共存, 多头并立, 曾国藩并没有综合的统帅权。况且, 曾国藩同治十一年(1872)就死去, 此后湘军依然存在。湘军的将帅或相关要员中, 有些人出任总督巡抚, 兼成为地方政要, 他们施政, 自然也要建立亲信班底。上述军、政势力, 综合起来便构成所谓“湘系势力”。构成它的具体的湘军组织、政务机构, 各自的成员资格都很明确, 活动也有相应的规范, 可视为“正式群体”。但综合构成的“湘系势力”, 从整体上看, 其成员资格、职责和活动相对地没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性限制, 缺乏组织上的规范性, 只是一种“模糊性”的“合群”, 应该算是所谓“非正式群体”(“非正式群体”也是“群体”)。下述它的一些基本构成要素和特征尤其需要注意。

**政缘性与地缘性的结合。**所谓“政缘性”即指政治条件方面, 于此起主导和决定作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当然是其上层集团, 可称之为“湘系集团”<sup>①</sup>。这个层面的人员明显地具有政治观点、政治利益、政治素质条件上的基本一致性。具体一些说来, 他们属汉族地主阶层, 多为士子出身, 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明显的经世致用倾向, 又跻身于军政官僚阶层, 有着一定权力和实力, 他们对清朝统治的危机形势, 尤其对社会政治腐败的流弊, 对八旗、绿营不堪其用的现实, 有着较为真切的体察, 相应有较强的阶级忧患和自救意识, 政治要求上相对一致, 抱有讨灭“贼匪”绥靖“内乱”而卫乡邦、卫君国同时也卫“圣道”的政治自觉性, 为此齐心协力地合作行动以追求共同建功立业, 成为清朝地主阶级中较有见识和生气的一股力量。所谓“地缘性”, 是指该群体势力总体上看是以湖南人为主。不光要员层明显如此, 即使湘军的一般士卒也是这样。不仅曾国藩初创湘军时在本省就地选员, 以后在外省作战补充缺额或是新立营头, 一般也都要回湘招募。就连在外省主政的湘系大员, 对所辖军队也力争改建为以湘人为主体的者。如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即为典型, 所统军队作为湘军战场上数年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支, 他尝言其军“五六万皆南省之士, 惟余云龙

<sup>①</sup> 需要特别说明, “湘系集团”和“湘系势力”概念的区别对本文来说是重要的。“湘系势力”的包含面相对广大, 指义上相对“泛”而“抽象”。“湘系集团”作为“湘系势力”上层的特指性称谓, 其成员一般应作为湘系要员, 这就有了更具体的实指性。

一营、余际昌四营乃鄂士”<sup>①</sup>，可见所谓“鄂军”实为“湘军”。这样做显然与利用籍贯上的认同感分不开。当然，在这方面其上下层之间也有一个利用被利用、欺骗被欺骗的关系。而无论如何，从总体上看，正是政缘性与地缘性的有机结合，才可能有湘系势力的形成。湘系要员所谓“风云际遇，时或使之，生当是邦，会逢其适”<sup>②</sup>，“天下名贤硕德蔚起湖湘间，电发飙举，斯亦千载一时之会也”<sup>③</sup>云云，这种情势的出现，正是政缘性与地缘性双重因素结合相促而成。

**“军”与“政”的结合。**湘军为湘系势力崛起的基础和支柱。湘军的形成，有着特定的时势条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业已腐败不堪的清朝国家经制军不能有效地镇压，起义愈发蔓延开来，清廷不得不动员和组织非常规的地方武装力量以求弥补，布置各省兴办团练，并委派有相当资格的官员在籍或回籍操办，即其一项措施。在籍丁母忧的曾国藩被派充在湖南履此职事，他立意借办团练的名义的别树一帜，移花接木地创立起有别于绿营的湘军，不但在本省更主要投赴外省作战。不过，由于清廷对湘军在利用的同时又存防范之意，对曾国藩进行限制，关键即在于不给他地方事权，只让他领兵打仗，致使其数年间陷于客寄虚悬的窘困境地。但终究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离不开湘军，是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并比较成功地经营湖北，使该省成为湘系势力的重要基地，给了曾国藩很大支持。及至清军江北、南大营彻底覆灭，镇压太平天国的全战线不得不开放给湘军，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兼统数省军务，湘系势力开始进入鼎盛期，不但湘军大规模扩充，而且诸多将领、要员纷纷跻身封疆大吏之列，在总督、巡抚中占据了很大份额。这样，所谓“湘系势力”就不仅仅作为单一的军事力量，而且实现了军、政的有机统一。军政结合成为湘系势力具有完备形态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军政互为依托，相辅相成，一加一大于二。离开了湘军的基础和支持，偌多湘系人员督抚政柄的攫得即无从谈起，而督抚政柄，对湘系势力的发展保障更显重要。曾国藩尝深有体会地说：“今日受讨贼之任者，不若地方官之确有凭藉”<sup>④</sup>。胡林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督符更重于兵符”<sup>⑤</sup>。故而，把“湘系势力”若仅仅视为“湘军势力”，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遗漏其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且也是忽视了湘系势力崛起过程中由军而政、由政促军的肯綮所在。

**“内层”与“外层”的结合。**湘系势力主体上是由湖南籍汉族人员组成是没有疑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绝对排斥湘籍以外的人员和非汉族人员（如满族人员）。事实上，湘系势力内部应该说有不同的层面，就其上层而言，又可以相对地划分为“内层”和“外层”。所谓“内层”，是指直接靠湘军起家的湖南籍军政要员，他们可谓志同道合，又有同省籍之谊，湘军建立以前许多人就多有联络，在建立和发展湘军及湘系势力的过程中，联络起更多的同道。他们间甚至不乏师生、同学、姻亲、世交、密友关系者，形成多边关系网络。他们的同道认同感很强，常把“吾党”挂在嘴边，“事事相顾，彼此一家”<sup>⑥</sup>，谊如金石。虽说因为个人性格、利益等方面的原因，有的人之间也难免有矛盾，但一到派系利益关系问题上，多能放弃个人恩怨，顾全大局。譬如曾国藩与生性狂傲的左宗棠之间，多年里便嫌隙常有，甚至有时候关系看起来相当紧张，曾国藩尝向胡林翼诉苦，说左宗棠“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sup>⑦</sup>。但及至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为忌恨他的政敌指控在湘抚幕府干政不法，面临一场大险大难的时候，曾国藩还是合同胡林翼等一班湘系要员们，努力营救，最终使之化险为夷。左宗棠因此案离开了湘抚幕府，是曾国藩接受他在自己帐下襄办、帮办军务，左氏由此不久便起家出任浙江巡抚，并兼独领一军，成为湘系的又一重要首领人物。后来左宗棠回顾他与曾国藩的关系，针对外间关于他们“交恶”的讥议，对家人言：“吾与侯（按：指曾国藩）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似之词，何值一晒！”<sup>⑧</sup>对于体察湘系内层的关系实质来说，这不失为一个侧面的典型事例。所谓“外层”，是指

<sup>①</sup> 胡林翼：《副训营稟请添招勇丁批》，《胡林翼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二册，第989页。

<sup>②</sup> 曾国藩：《复庄受祺》，《曾国藩全集·书信》第二册，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021页。

<sup>③</sup> 郭嵩焘：《名贵手札跋后》，《养知书屋文集》，光绪十八年刻本，卷7，第20页。

<sup>④</sup> 曾国藩：《致胡林翼》，《曾国藩全集·书信》，第一册，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692页。

<sup>⑤</sup> 胡林翼：《致书局牙厘局文案》，《胡林翼集》，第二册，第600页。

<sup>⑥</sup> 曾国藩语，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6页。

<sup>⑦</sup>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7年第2次印刷本，第17页。

<sup>⑧</sup>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231页。

由或非直接靠湘军起家，或非湖南籍，但在一定时期内与湘系内层有着基本一致的派系特点和利益，并且具有直接联系和协同行动的一类军政人员。在湘系内外层的整体上，“外层”是处于相对次要的辅助地位。“外层”人物譬如满籍和非湘籍的汉员将官（前者像塔齐布、多隆阿，后者如鲍超，都是很典型的人物）、“内层”要员的有关僚属（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在出任疆吏后仍在一定时间里，能与湘系保持较密切的关系），还有在湖南基本上能与湘系协同共事的大员（如张亮基、骆秉章）等。“外层”人物不但在湘系的地位上与“内层”有差异，而且时间上亦或带有暂时性，因故变动的可能性大。如多隆阿，主要是受到胡林翼的重用，在湘军战局中一度起到颇为重要的作用，及至胡林翼去世不久，其人便在湖广总督、满族人员官文的支持下，西上陕西而脱离湘系。湘系内外层的有条件的结合也是湘系势力的构成特点之一。

**一般兵员与上层的关系。**前边提及湘军整体上属于湘系势力，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广大的湘军士兵，他们在阶级来源、政治身份、利益要求上与上层明显有别。湘军的组织原则乃“选士人领山农”<sup>①</sup>，也就是选读书人充当军官，以“山农”作为士卒。士卒的具体“募格”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sup>②</sup>可见，其士兵主体的来源，不但是农民，而且是要“朴实”的农民。这种人应募加入湘军，最直接的目的是“吃粮”、拿饷，维持自身生计和供养家人。似不必责难他们“阶级觉悟”低下甚至是阶级上的背叛，那时农民们恐怕难有自觉的“阶级意识”，解决生计问题是他们最现实的要求，就此而言参加太平军与参加湘军或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他们难有湘系要员们那样的见识和高远的政治目标。所以就“政缘性”条件而言，他们与上层难能说基本相同。单从这一点来说，把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有人视作“分明是农民打农民”<sup>③</sup>，并不是没有一点现象上的实在。当然更实质的问题在于他们毕竟是被湘系上层收买和利用了，客观上是服务于湘系上层的政治目的的。“湘系势力”上层与一般士卒的关系，既存在着出身来源上的阶级分野，又在特定时间里的“社会行动”上构成统一，下对上有着连带的附属性。这是一种颇为复杂和微妙的关系，体察这一点，对认识其最后产生分化和对社会的相关影响也是重要的。

按照社会学理论，群体是最基本的社会实体形式，是人们社会行动的集合，是联系个体与社会的中介，也是社会结构状态中的稳定的组成部分。<sup>④</sup>由此看来，以上对湘系势力群体构成要素和特征的审视，既是从社会结构的一个构成部分上着眼，又可藉此基础进一步扩展到它与社会多方面的联系上，从更广阔的范围，考察其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的影响。这种影响更是多方位的。按照社会学社会结构学说中的“系统”观点，“社会结构一般都具有多因素性、多层次性和动态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系统”，而“社会系统划分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这样三个基本的子系统，是相当普遍的也是易被广泛接受的划分法”<sup>⑤</sup>。诚然，即使不说什么“系统观”，对社会分为经济、政治（包括军事）、文化这样三个最为基本的方面来看待也是最为通常的，因为它们合起来的确能够基本概括社会的全貌。从湘系势力崛起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的影响来看，也涉及到这几个方面，而最主要和典型的是在社会政治方面，起码下述一些事项特别醒目：

### 第一，对军制的影响。

晚清军制的变革起源于湘军的产生。最直接的，是它由“勇”而“军”地位的奠定，使原清朝国家经制军队退居次要地位。“勇营”并非始于湘军，此前即曾有过，但那只是临时性、辅助性、非正规的武装力量，战事完结须予解散。湘军尽管也惯被视为“勇营”，实际上，此勇已非彼勇。试想，如湘军要员所说，清朝“官军”“已成废器，即令千人为营，而十贼可破”<sup>⑥</sup>，既然如此地不

<sup>①</sup> 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7页。

<sup>②</sup> 曾国藩：《营规》，《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63页。

<sup>③</sup> 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绪言》中语，罗尔纲《论湘军》（《晋阳学刊》1982年第3期，辑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百题》上册）一文中引述此语，指斥为“谬论”。

<sup>④</sup> 陆学艺主编：《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73、96-97页。

<sup>⑤</sup> 陆学艺：《社会学》，第296、303页。

<sup>⑥</sup> 胡林翼：《论东路事宜启》，《胡林翼集》，第二册，第118页。

中用，那么，不但镇压反清起义的战时需要以湘军以及稍后起来的淮军作为主力，而且事平后充当常备军，发挥军队作为国家机器中最重要部件的应有功能和作用，原经制军队也必然不再合格。于是遂有防军、练军的出现。“防军是招募来的军队，练军是从绿营挑选出来编练的军队。这两种军队，都用湘军的营制、营规、规章。至于绿营虽复旧制，不过形同虚设，其比较精壮的已挑选为练军，不复募补，其老弱留底营的，复逐渐被淘汰，于是绿营之制，不但形同虚设，实仅存虚名。国家卫戍之责，遂专于防练军”<sup>①</sup>。这是对湘军和晚清兵制有专深研究的前辈学者所要言不烦地揭示出的有关情况，可见湘军在这一军制变革环节上的基础性作用。防军、练军可以说是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军队，是清朝传统的旧制军队向“新军”演化的中间过渡环节，是清朝统治者在不得不认可传统经制军失灵而行变革，但一度又不想进行过大变革的情势下，一种“调和性”的产物。有研究者把“练军”视为“灰色的历史标本”<sup>②</sup>，也许可以说，这种“灰色”正是源于练军所沿袭的湘军“母本”。

从湘军的制度上看，它与绿营相比是有很大不同，但这种不同主要并非军队“旧式”与“新型”的时代性差异。有研究者对湘军与绿营制度上的不同有这样精要的概括：“绿营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国家对于士兵，本身登于名册，家口著于兵籍，尺籍伍符，兵部按户可稽。国家对于将弁，铨选调补，操于兵部。至于军饷，则由户部拨给。故其时全国绿营兵权，全握于兵部，归于中央。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其制恰恰与绿营制度相反，故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到湘军制度代替了绿营制度，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代替了兵权掌握于兵部的世兵制度，于是兵制起了根本性变化，军队对国家的关系也就立即跟着改变。”<sup>③</sup>如果说世兵制变为“募兵制”，还包含些时代性进步的因素，那么，自行招兵选将和“兵为将有”的这种“私属性”变化，固然对于当时扩大统兵者的自主权，提高指挥效能，防止八旗、绿营那样运转不灵的弊端，有其实效，但这又恰为近代军阀的产生奠定着军制方面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湘淮军是近代军阀武装的胚胎（尚没有正式成型）不无道理。这样来看，未必能算是制度上的进步。至于湘军在军饷的额度上比绿营有大幅度提高，其训练要求上比较严格，注重思想教育等，虽也是有异于绿营的地方，但这些就“军制”而言，已属末节。至于湘军的兵员素质条件要求，并无时代新意。该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也缺乏锐意求新的追求，相应训练方式方法相对老套。在这一点上，倒是由惊羨洋兵“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sup>④</sup>的李鸿章建立起来的淮军，明显先进，它在这方面与以后“新军”有一个顺向的衔接。这与它和湘军基本同制，但在某些方面和环节上又有趋新性异化的情况分不开。当然，既然淮军也是本自湘军，那么，后来在军制上的一系列变化，最终溯源于湘军的初基也是应该的。可以此为肇发点，顺藤摸瓜地梳理军制变革的轨迹以及探查其中的窠奥。

## 第二，对统治集团内部结构性变动的影响。

所谓“督抚专政”、“外重内轻”局面的形成，是湘系势力崛起后清朝政局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总督、巡抚作为省区的最高官员，其实际权力的轻重在湘系势力崛起前后有很大差别。本来，总督、巡抚实际能够控制的军权有限，特别是“凡有大寇患，兴大兵役”之时，朝廷“必特简经略大臣及参赞大臣驰往督办，继乃有佩钦差大臣关防及号为会办、帮办者，皆王公亲要之臣”，“总督、巡抚不过承号令、备策应而已，其去一督抚犹拉枯朽也”<sup>⑤</sup>。并且，在省政上，也被并不为其属吏的布政使、按察使所分权。及至湘军崛起，其一些要员相继出任督抚，军、政合一，实力大增，对地方的控制力迅速加强。或谓其时“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sup>⑥</sup>。作为湘系党魁之一的左宗棠尝言：“今之文武错落半天下号称楚材者，莫非当初相识习知习见之人。”<sup>⑦</sup>据统计，“湘军领

<sup>①</sup> 罗尔纲：《湘军新志》，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影印本，第22页。

<sup>②</sup> 皮明勇：《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sup>③</sup> 罗尔纲：《论湘军》，《中国近代史百题》上册，第169页。

<sup>④</sup>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全书》，光绪末年金陵刻本，《朋僚函稿》卷1，第20页。

<sup>⑤</sup> 薛福成：《叙疆臣建树之基》，《海外文编》，上海醉六堂光绪二十二年石印本，卷4，第5页。

<sup>⑥</sup> 王闳运：《湘军志》，第61页。

<sup>⑦</sup> 左宗棠：《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影印本，第2876页。

袖之任督抚者，仅湖南籍者二十四人”<sup>①</sup>，特别是在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出任两江总督以后，到太平天国都城被攻破的同治三年（1864），短短数载，湘系要员出任督抚者就十来人。这时以湘系人士为主导的督抚大员们，不但控制着很大的军权，并且以饷事为由头，也把握地方财权，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几乎瓦解。其民政、司法方面的权力也大大加强，布政使、按察使不再能像以前那样独立行使职权，而要听命于督抚，事实上成为督抚的属吏。总之，这时督抚对地方上的方方面面的权力，可以包揽把持。清廷集权、专权的局面被打破，外重内轻的势头出现，并且愈演愈烈，竟至“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而为督抚者，都各专其兵，各私其财，唯知自固疆圉，而不知有国家”，“故康有为至以当时十八行省，比于十八小国”<sup>②</sup>。这种情况显然能够证明，清廷控制地方的权力相对明显下降。

由于汉族地方实力派的强盛，他们中有些人获封爵，有的甚至是颇高的爵位，“民爵”<sup>③</sup>贵族阶层的成分较前发生明显变化。有著述中统计分析：晚清时期获封侯伯子男各级各等爵位者 34 人，其中旗籍 7 人，占 20.59%；汉族 27 人，占 79.41%，汉族勋贵占绝对优势。而在晚清以前 383 位封爵者中，旗籍有 352 人，占总数的 91.12%；汉族仅 31 人，占 8.88%，汉族贵族在整个贵族集团中的数量微乎其微。而晚清新晋的汉族贵族，主要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立下“战功”的湘淮系官僚。像受封侯爵（晚清无封公者，最高封至侯爵）的四个人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其中李鸿章初封一等肃毅伯，死后晋赠一等侯世袭）。<sup>④</sup>封爵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对贵族资格的一种认定。尽管晚清时的封爵规模明显缩小，或有限制这一阶层扩大的隐意，但从有限的获封者来看，重点转向汉族特别是湘淮系人员已是不得不如此的事情。

军功崛起层的膨胀也很醒目。平时，在中国传统上的这样一个重“文治”的社会环境下，不但“尚文”的社会意识是浓重的，而且“以文制武”具有制度上保障性。胡林翼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给安徽巡抚王植的信中，就大为感叹“国家设立官制，武籍于文而文尝轻武”，以“文武之不调和也”，他指出片面注重文途的严重弊端，有谓“学校衰而下无实学，科举滥而士无真才。负贩之贾，得乘君子之车；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呼吁“武弁宜注意也”<sup>⑤</sup>。胡林翼是个政治敏感性很强的人，当时太平天国起义尚未爆发，他是从社会氛围上觉察到“肇乱”的苗头，因而作此建策的。“文”“武”的地位既然有如此反差，那么在铨选封赏之事上自然也要相应地体现出来，重在文治之功而非修武之绩，何况，平时没有典型的战事，“战功”更谈不上。及至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苗、回等少数民族起义相继爆发，清朝统治岌岌可危，燃眉之急，常规岂能再顾，最紧要的就是枪炮说话，胜者王侯败者贼。有些平时斯文如圣、文治彰显的官员，面对“匪乱”惊慌失措，一筹莫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被贬被革乃至逮治杀头者并不鲜见。而科举功名不显或是没有，甚至仅乡间勇夫，只因为涉身军旅，在“平贼”的作战中显其身手，建立武功，因而被超常地授职封赏者却大有人在。试想，像湘系的杨岳斌（载福）、彭玉麟，淮系的刘铭传这类人物，若非军功，在平时能获那样的高职重赏？即使江忠源、左宗棠辈恐也难可能。湘淮系要员中偕多人纷纷得以获擢督抚、提镇之类的文武高职以及各种荣显的封号，靠得主要就是“军功”的杠杆。更多获得较低级官职封赏者也主要是靠此途径。当然实职官缺毕竟有限，更多的建立“军功”者是被给以虚职荣衔。《清史稿·职官志》中说“湘、淮、楚营士卒，徒步起家，多擢提、镇，参、游以下官，益累累然”<sup>⑥</sup>，似乎是“虚”“实”兼指。经镇压太平天国军务，统计各省军营保至武职三品以上的将士不下数万人，其保至三品以下的人数必较多于数万人<sup>⑦</sup>。总的看来，军功一时成为擢官封赏的特别捷径，武

<sup>①</sup>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第 390 页注。

<sup>②</sup>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 244 页。这段引语中除最后一句，前面话语是罗尔纲据康有为语所作编录。

<sup>③</sup> 据龚书铎总主编、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中介绍，清代“非皇族贵族”，包括“满蒙贵族，还有汉族勋贵，统称为‘民爵’”（见该书第 309 页）。

<sup>④</sup> 龚书铎总主编、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第 310~311 页。

<sup>⑤</sup> 胡林翼：《致王植》，《胡林翼集》，第二册，第 1~2 页。

<sup>⑥</sup> 《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12 册，第 3390 页。

<sup>⑦</sup> 三品以上数万之说曾国藩在上奏中明确言之。罗尔纲先生根据“军营的保举，是从低而高的，品愈低则人数愈多，这是一定的事”推断，所得三品以下人数“必较多于数万人”，当然是合理的。见《湘军新志》，第 175 页。

事得意，军功崛起的群体迅速膨胀，武政受到重视，“尚武”风气趋盛。这为近代军阀的逐步形成，奠定着社会基础。

满汉势力的明显相对消长变化，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清朝是由满洲贵族入关建立的政权，它在不得不与汉族地主阶级建立联盟统治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维护满洲（连带蒙古乃至汉军旗）贵族的特权地位，从官缺的定制、官员的任用、爵位的封授以及民族政策上，都能够体现出来。这种满汉差异，既是一种国内民族关系上的不平等，也是统治阶级内部阶层关系上的高下有别。而随着湘系势力的崛起，满汉关系方面的传统状况也开始被打破。这从上面述及的汉员督抚、封爵者、军功获取者规模明显扩大的情况，即可以证明。从督抚旗籍和汉员比例的前后变化情况来看，根据有的研究者所作统计，嘉庆年间旗籍总督、巡抚所占百分比分别为 59.6%和 42.1%，到同治年间分别降至 26.3%和 4.1%<sup>①</sup>。而湘系势力的最鼎盛时期正是在同治年间。此时督抚的旗员比例大降而汉员大升，与湘系要员纷纷出任封疆直接关联。当然，这样的变化，也并不意味着，自此以后满汉尊卑有别的防线在清朝最高统治层的头脑中完全撤除，竭力维护一有时机甚至要制造反弹的情况依然存在，但总体上看这种防线削弱是大势所趋。一些满洲贵族人员，较早地就有明显的“重汉”倾向，胡林翼、曾国藩之流人物的最终崛起就得益于他们的支持。像内任部堂、外擢封疆、贵为相国的文庆即尝言：“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曹然于大计者乎”！他“平时建白，常密请破除满汉樊篱，不拘资地以用人”<sup>②</sup>。即使像以专横著称的肃顺也认为，“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sup>③</sup>。有谓若辈对湘系“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sup>④</sup>。这表明，排汉思想观念，即使在满洲权贵层也不像早年那样牢不可破，这显然是源自时势条件刺激下的省识。

### 第三，对民间秘密会社的影响。

作为湘系势力崛起支柱的湘军，虽然越来越不同于通常的“勇营”，但“勇营”的某些组织特征也有保留，不像常规军队那样组织上相对稳定，而随时募集和遣散的变动较大，这是出于整饬和应付变故等原因。尤其是攻下太平天国都城以后，曾国藩主要为避免清廷的疑忌，保身防祸（当然不能明确这样向清廷言，而是借其他种种理由），采取“裁湘留淮”的策略，在不长的时间里，大力裁撤所部湘军，一时形成数以万计的人由军转民、回归社会的情形。这是一个难度很大、易留严重后遗症的事情。习惯了军旅生活，再归乡务农会产生职业上的不适应。特别是“功成”之际遣散，易使本有借军旅生涯改变命运之图的人们产生莫大的心理落差。最为现实的棘手问题是欠饷的发放。湘军的饷额较高，但通常不是全数足额发放，而是按一定比例扣存，待最后清结。大规模地骤行遣散需要清还的饷资数额巨大，一时难以筹足，故闹索积欠的风波不断，哗闹事件屡屡发生，闹事的人们自也难能安心顺意地回归乡间。数以万计的因军功被保获虚职的人员，因为实缺有限待补无望，他们凭借已有的资格，难以再安于乡间平民的生活。凡此种种因素，都是促使被裁遣离军者到社会上另寻他途的因素。

民间的秘密会社，对这些人来说就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吸纳器。在相关的长江流域省份，秘密会社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哥老会。哥老会在晚清前夕即已存在，组织制度上也比较复杂，有纪律和违犯纪律的相应惩罚。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在动荡的社会形势下，哥老会既与反清起义有联系，甚至其成员就有直接发动起义者（如李永和、蓝大顺在四川），同时也与湘军有着瓜葛。知情者有言：“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

<sup>①</sup> 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集刊》，第四期上册；郭汉民《太平天国与清季政治》（《载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文中引述，并考察分析了满汉力量的对比变化问题。

<sup>②</sup> 薛福成：《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庸庵文续编》，上海醉六堂光绪二十三年石印本，卷下，第 3 页。

<sup>③</sup> 尚秉和：《辛壬春秋》，卷二十六，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 1 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66 页。

<sup>④</sup> 薛福成：《肃顺推服楚贤》，《庸庵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 页。

湘军亦多有。”<sup>①</sup>鲍超为湘军的一员悍将，所部为“霆军”，由于他四川籍的关系，哥老会较早地向其军渗透发展，进而向湘军其他营伍扩张，这不失为哥老会在湘军中发展的途径之一，但也不是唯一。事实上湘军处在游民的包围之中，所浸染的一些风习，实与帮会很有相通之处，它无法抗拒哥老会从多条途径的渗透。总之，湘军较快地就与秘密存在的哥老会组织发生了密切的勾连，想割断其联系难能做到。统兵将帅们一般也只能含混其事。随着不断有被遣散离军之员游荡于社会，他们进入哥老会组织可以说是轻车熟路，顺势而行。尤其是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后的大规模裁军，更是为哥老会组织的膨胀提供了契机。其时有人向清廷奏称：“两湖地方有哥弟会（按：即指哥老会一类组织）之目，皆系散勇为之，自数十百以至数千万人，愈集愈多，地方官兵力单薄，无法禁止。”<sup>②</sup>又有知情者言：“湖南营勇，立功最多，旋募旋撤，不下数十万人，而哥老会之风，亦遂于湖南为独炽。”<sup>③</sup>其实，对散勇为患的问题曾国藩早有担心，在大规模裁撤湘军之际，他在一封家书中就说：“吾乡他无足虑，惟散勇回籍者太多，恐其无聊生事，不独哥老会一端而已。”<sup>④</sup>至于他的治患策略，是尽量不张扬湘军散勇转为“会匪”作乱之事，所谓“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罪”者是指谋反叛逆，杀人伤人，聚众抢劫，造蓄军器，“当堂讯供之时，但问本案之是否供认，不问平日之曾否入会”<sup>⑤</sup>。很显然，是怕究查起“会事”来，使问题更复杂化。为此，他甚至有意遮掩湘军人员的“哥老会匪”事，有言“湘人得保大官回籍，虽多穷困不得志之员，而敢为戎首力能倡乱者，尚未所闻”<sup>⑥</sup>。而事实上其加入哥老会“作乱”者所在多有，于此罗尔纲《湘军新志》中就举及诸多事例，足以证明。的确曾国藩这种尽量遮掩、宽大的处理办法对暂时性地化解事端显有效果。不过，正如有的论者所言，“这种办法，只不过是一个一时应付的办法。这个问题，在当日却还是始终无法解决的”，后来“哥老会势力又从湖南传播到湖北去，两湖成为会党的潜伏地。到了光绪末年，哥老会加入革命党，同做反清的大革命运动，于是造成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sup>⑦</sup>。如果这样看，真是如该论者所言造成了“一件历史奇迹”。

至于湘系势力崛起对社会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影响，这里不再详论，只是为了顾及整体联系性，点到而已。社会经济方面，湘军军饷要靠就地自筹辅以有些省份协济，这自然会加重民众的经济负担，特别是把厘金作为一条重要的攫饷途径，对民间商业的危害很大。湘军野蛮的抢掠，战争的破坏，对社会经济摧残更巨。而另一方面，湘军首领和湘系要员中，有的人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对洋务运动有着开路引领的作用，而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之大自然不待言。社会文化方面，我们知道湘系要员多为传统文化造诣颇深之人，曾国藩尤其是，他从军从政不废文，且其“学以官贵”，对晚清时期理学的复兴、桐城文派的得势，都起着重要作用。此外，他还是对外派遣留学生的领首促成者。将湘系势力崛起对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与上面着重论述的对政治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审视和思考，自更有助于从整体联系上把握它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动态势。

还需要注意到，湘系势力崛起在晚清湘系、淮系和袁世凯北洋势力“三环链”中肇端环节的作用。就湘、淮关系来说联系尤为密切，可以说淮系是由发展到特定阶段上的湘系分化形成的，或谓“淮由湘出，本有水源木本之谊”<sup>⑧</sup>。曾国藩、李鸿章之间存在师生和幕主幕客的特殊关系，但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时毕竟又只能属湘系外层人物，及至他在特定时机下独立山头，发展起与湘系一度并存，且有后来居上势头的淮系势力。湘、淮之间既有群体上的某些基本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总的看来，是淮系趋新性更强。籍地河南而投身于淮军的袁世凯，自甲午战争中获得编练新军之机，此后逐步从淮系中分离出来经营起自己的北洋集团势力，在他这里正式形成近代军阀，最终代清而

<sup>①</sup> 王闳运：《湘军志》，第18页。

<sup>②</sup> 御史李德源同治八年九月初六日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转据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2页。

<sup>③</sup> 薛福成：《附陈处置哥老会匪片》，《出使奏疏》光绪二十年刻本，卷上，第47页。

<sup>④</sup> 曾国藩：《致澄弟》，《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二册，第1270页。

<sup>⑤</sup> 曾国藩：《复刘崑》，《曾国藩全集·书信》第九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335~6336页。

<sup>⑥</sup> 曾国藩：《复刘崑》，《曾国藩全集·书信》，第九册，第6251页。

<sup>⑦</sup>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14~215页。

<sup>⑧</sup> 柴萼：《梵天庐丛录》，中华书局1925年铅印本，卷4，第32页。

又一度把握民国政柄。从湘系、淮系、袁世凯北洋势力三大集团势力的复杂关系，以及递进嬗变的轨迹中，看湘系的奠基和肇端的地位、作用，也是审视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影响的一个基点。

## **Rise of the Hunan Faction and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ONG Congl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Hunan faction is an importan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for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s argued that the Hunan faction combined politics and geography, military and politics as well as core and periphery and had a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ldier and top officers in terms of its el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rise of that faction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force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military system, inner structure of the ruling group and evolution of people's secret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oreover, its influence also extended to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ields. The rise of the Hunan faction apparently has an function of laying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a process of power transition from the Hunan faction to the Anhui faction and then to Yuan Shikai's Northern Warlords.

**Key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Hunan Faction; Social Structure

**收稿日期:** 2006-01-12

**作者简介:** 董丛林 (1952<sup>-</sup>), 男, 汉族, 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通讯地址: 石家庄市红旗大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